

城市大爆炸：巴黎、芝加哥、
墨西哥城公众住房 1850 ~ 2000^①

Metropolitan Movement: Urban Vicissitude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Harold L. Platt 文

黄潇颖 译

秦瑞芳 审校

城市大爆炸：
巴黎、芝加哥、
墨西哥城公众住房
1850 ~ 2000

【摘要】在《资本主义的秘密》(The Mystrey of Capital)^②一书中，新自由主义^③的宠儿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认为，稳固的产权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赢得了胜利而在他处失败”的原因。社会学家指责他过于简化贫穷的起因和补救方法，但是历史学家们几乎没有参与这场重要的政策辩论。跨越时空的比较分析比如回溯性分析，将揭露德·索托论题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德·索托认为从农村来的移民试图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城市找到一席容身之地，决定他们这一命运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是产权法。连续五十年对巴黎、芝加哥和墨西哥城分别进行的案例研究支持他的这一观点。但是在每一个案例中，居住房产对城市的社会、自然地理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比其交换价值要复杂得多。这篇文章阐明了其中一些非主流的经济效用和内含的、地方认同的文化意义。文章也说明了城市增长机器是如何通过给一些人制造不标准的日常生活条件这种环境上的不公平，使得另一些人的财产得到了升值的。

【关键词】住房 产权法 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巴黎 芝加哥 墨西哥城 种族 阶级 社会公平

Abstract: In *The Mystrey of Capitalism*, the darling of neoliberalism, Hernando de Soto posits that secure property titles explain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While social scientists have taken him to task for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poverty, historians have contributed little to this important policy debate. Applying comparative methods across time and space, such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exposes serious flaws in de Soto’s thesis. Case studies of Paris, Chicago, and Mexico City covering successive, fifty-year periods support his contention that property law w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fate of rural migrants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live in these exploding cities. But in each case, residential property played a far more complex role in creating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city than its simple exchange value. This article illuminates some of these alternative economic uses and embedded cultural meanings of identities of place. It also shows how urban growth machines create capital value in property for some by creat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f substandard conditions of everyday life for others.

Keywords: housing, property law, Hernando de Soto, Paris, Chicago, Mexico City, race, class, social justice

作者: Harold L. Platt,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历史系

译者: 黄潇颖,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硕士

审校: 秦瑞芳, 硕士, 现任职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① 本文原文于2010年发表在《城市历史》(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6 (5) 575-593)杂志上, 本文翻译已取得原杂志社授权许可。

② 作者在原文中写的是 *The Mystrey of Capitalism*, 书名有误(译者注)。

③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经济学概念, 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 主张减少对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译者注)。

当涌向城市的移民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该城市的住房供给量时，会发生什么呢？我先提出一个简单的观点，那就是这些人不得不去找个地方住下。即使是所谓的“流浪汉”也得要找个地方睡觉、找个地方生存。自从有了铁路，人口密集型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已增长至全球范围。联合国估测，人口分布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历史上首次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不是乡村地区。它还预测，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至少有十亿人）所居住的是不达标的住房，或露宿街头^[1]。

采用时空比较法有助于回答我的问题。我从巴黎开始，因为它是最先经历了铁路所带来的爆炸效应的城市之一。“19世纪中叶的巴黎在许多方面都还是一个中世纪城市，”住房问题专家安-路易丝·夏皮洛（Ann-Louise Shapiro）如是说。然而，之后的20个年头里，这个城市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200万，并且这种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从1900年开始，我把非裔美国人^①向芝加哥50年的“大移民”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案例。纯数量（从3万人到5万人）只能说明一半问题，因为这批移民被迫挤在有限的空间或种族隔离区（Ghetto）里，从而形成异常高密度和过度拥挤的居住区。

第三个案例——墨西哥城，代表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兴起。这座城市经历了超过七倍的人口增长，从不足300万增长到今天超过2200万人，它标志了无合法土地产权的自建住宅蔓延增长。这种非正规的规划建设或自建社区（Colonias Populares），占该城约60%的住户和土地使用^[2]。

以上三个案例研究大大支持了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论点：“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赢得了胜利而在别处失败”。尽管这个秘鲁人还不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知，但他是世界最具影响的经济大师之一。他认为在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财产在法律和政治上的神圣不可侵犯，产生了发展经济的投机资本。相反地，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中，正规所有权的缺乏，产生了数百亿美元的“呆滞资本（Dead capital）”，这些资本不能被再投资，无法积累个人和集体财富。“他们有住宅，却没有产权，”德·索托阐述道：“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地契，有业务，却没有公司条令。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秘

密。”对于那些希望在大城市找到一席生存之地的农村移民来说，产权法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都更能决定他们的命运^[3]。

1 巴黎，1850~19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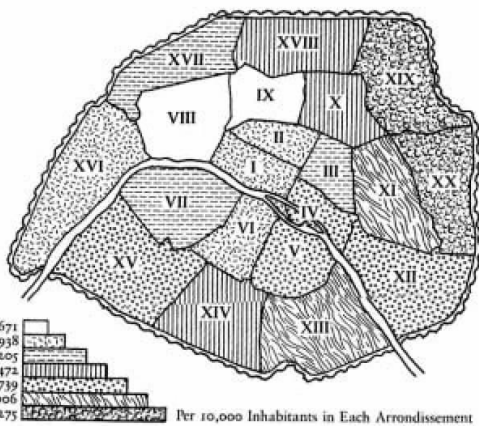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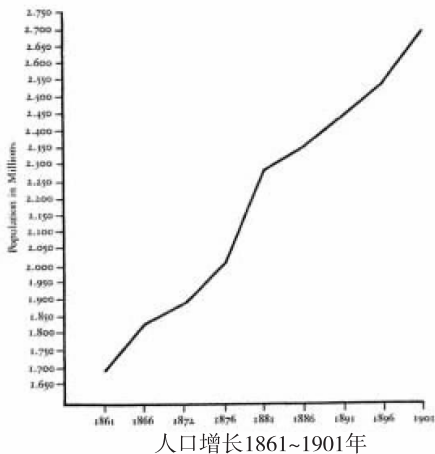
在现代欧洲的发展中，巴黎一直处在伦敦的阴影之下。不列颠的首都在1800年就已经是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它作为一个“爆发性城市”（Shock city）已经是150年前的事情了。巴黎更加适合作为以钢铁和煤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的城市模板。通过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自然的大都会》（Nature's Metropolis）一书，我们大多数人熟悉了那段进程。正是在那个进程中，铁路把城镇和乡村连了起来。就像伦敦一样，法国资本的建立是在过去的数世纪，但是农村移民所导致的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始于19世纪中叶。在接下来的20年里，铁路网总长度从不足2000km增加到了17400km，同时巴黎的居住人口也增加了100万。巴黎不断吸纳大量新移民，1878年和1889年的两届世界博览会更是使得涌入巴黎的人潮达到了高峰，他们来此寻求工作和更好的生活。考虑一下，这座城市仅在1876~1881年这五年内就增加了28万人，而在之后的十年里，又增加10.3万人^[4]。

在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的第二帝国时期^②，基于等级划分的城市空间不断分离，使得住房短缺和衰败问题更加恶化。那个时代的人说：“首都已经变成了两个城市，一个富有，一个贫穷，且后者包围着前者。”富人较好的住宅倾向集中于城西和中心的行政区（Arrondissements），而穷人则被驱赶到城东和外围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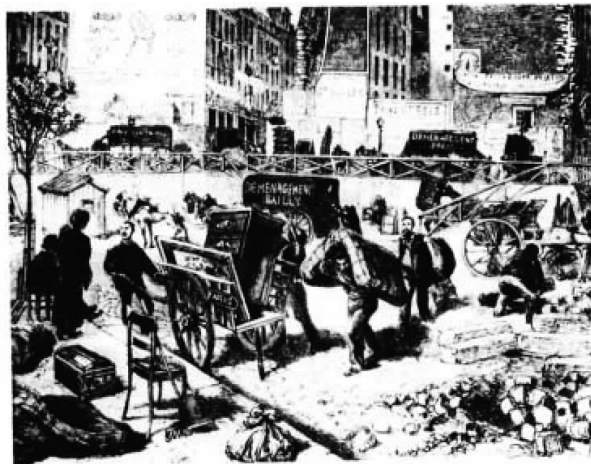
在某种程度上，巴龙·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ene Haussmann）——一个自诩为“拆除艺术家”的人——应该要为这种社会隔离负责。他的城市更新推土机迫使约35万人搬离家园，其中大部分都是穷人。这一行为助长了房租上涨的势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开销。缺乏基本城市服务设施的棚户区（Shantytowns）开始在城市中心和刚刚并入城市的外围环形郊区地带迅速蔓延（图1），而一个世纪之后，棚户区是第三世界城市非法聚居区的先兆^[5]。

① 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是对黑人的安全称呼，实际上就是指黑人（译者注）。

②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以区别于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帝国（1804~1814年）。



每1万人中生活在过度拥挤环境下的人口比例分布图



因城市更新而被迫搬离的巴黎人



棚户区

图1 巴黎的扩张 (1859 ~ 1900 年)

如德·索托所言，西方产权的神圣性的确立历经了数十年的复杂过程。就法国来说，路易斯·拿破仑在将资本流入城市地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一场信贷体系的革命，”城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言之凿凿，“它产生了空间关系的变革……巴黎的地产作为纯金融资产、一种虚拟资本形式不断增值。其虚拟资本的交换价值，融入整个资本流通中，完全主导使用价值^[6]。”

奥斯曼推行的公共建设项目和不断增加的地租压力共同引起了风靡偷工减料建造的即时棚户区，产生（男性）出租房屋和没有基础设施的非法地块。哈维认为：“这种‘增长机器’的逻辑一旦运转起来，就很难停下来。这个逻辑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通过不断加重的空间隔离为被创造的地产价值和所服务的对象寻求保障^[7]。”

不断加剧的地租压力也迫使巴黎成千上万的工薪阶层

不得不绝望地选择居住在过度拥挤的公寓里或露宿街头。路易斯·拉扎尔 (Louis Lazar) 是奥斯曼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记录了在环绕城市的公共用地上出现的棚户区，曾经位于那里的旧城墙在当时也被推倒了。在当局停止他的印刷业前，他还记述了寮屋居民在城市空地上到处搭建临时住所的现象。从城市中心一路走到城墙，拉扎尔数下来共有 269 条胡同、庭院、寓所和在无任何政府条例的许可下建造的棚户区^[8]。

尽管这位记者被限制言论，但是由公共卫生学家所拉响的警钟却是捂不住的。医药史学家一致认为当时每个巴黎人实际上都感染了肺结核。然而，人们只是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才会生病，也只有部分人死于此。在当时，其比例是，十分之一的人感染生病，百分之一的人死于此。肺结核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通常攻击的是人们的肺，通过咳嗽和吐痰的唾液传播。人们也会因为食用已经感染病毒

的牛肉和牛奶而被传染。环境和生活方式都是造成人们感染这种疾病的因素。

与此同时，同一批专家们对肺结核得病率在法国之外的欧洲国家下降的原因展开了争论。死亡率的下降是因为在温饱方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因为卫生、住房法规和公共保健措施等城市环境的改善呢？对于法国来说，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回答，因为直到1880年代才有系统的记录，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而且，这种疾病在社会的污名意味着许多有同情心的医生拒绝通报病患，且掩盖他们的真正死因。大卫·巴内（David Barnes）持一种合理的中立观点，他认为“许多肺结核病患者在一系列影响综合健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这些环境条件包括虚弱的、被榨干的劳动力；很少或没有工作保障；贫乏的薪水；糟糕的饮食；贫民区住房；脏污的身体和环境；酗酒。回顾一下，看来很显然这些条件都是相互关联，甚至是密不可分的^[9]。”

这件对大多数当代人显而易见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复杂，他们把原因和结果简化为住房和疾病间的简单平衡。在参观了1878年世博会的1600万人之中，有一大批的医生、工程师、建筑师以及统计学家参加了卫生大会（Congress of Hygiene）。在巴黎举办这样的国际大会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法国的卫生学家已经率先创立了医药地理学。在之前的疫情蔓延时期，他们记录下死亡的发生地点，从而生成了所谓“标点地图（Spot maps）”。而且，尽管奥斯曼的方法冷酷无情，但是他的目标却是在于改善城市的健康状况。他除了建造宽阔的露天街道和公园等知名工程之外，还扩展了城市地下给水、排水管道网络。结果使得富人居住区死亡率有所下降，这让人们更加坚信了城市空间与健康之间的联系^[10]。

在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肺结核病菌（TB germ）这一重大突破之前的四年，卫生大会由环境决定论的支持者所掌控。尽管由弗里德里克·勒·普雷（Frederic Le Play）所领导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依然坚持“道德病源论”，责怪病患身体不佳，但是大多数的与会者都和裘勒·西蒙（Jules Simon）一样认为更好的住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另外一位与会者，埃米尔·特拉特（Emile Trelat）同样将现代生活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起因。“秩序、安全、道德和卫生保健，一言蔽之，工业人口的繁荣与工人居住特点紧密联系^[11]。”行走在博览会的园区之中，与会者们无不坚信一个依葫芦画瓢的现实城市也将产生出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然而，在博览会园区之外，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日益

恶化，并伴随着病菌理论的兴起，引发了政治危机。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市议会和塞纳省省长都开始重视住房改革问题。世界博览会对低收入家庭所产生的压力被若干激进组织转化为一股政治力量。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妹夫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决定要组织起一个棚户居民联盟（Tenant's Leagues），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例如，1876年城市中的14万人居住在9000套出租房，在之后的六年里来世博会寻找工作的临时工们使得人口急剧膨胀，几乎是25万人挤在11500套出租房内。再加上两次伤寒流行病在这些拥挤的住宅区里的肆虐，那么应该是时候要清理这些出租房了。其他的一些激进组织开始用住房问题煽动工人们。在1883年，他们以出租房问题为主题召开会议，拟订了非常多的请愿要求。政府官员由于恐惧社会底层爆发动乱而对尖锐的改革呼声做出了回应^[12]。

不过，巴黎人的政治文化使每一个要求增加国家治安权来规范私有财产的提案落空。当然，把这种政治文化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是简化论者对一段高度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简化。但是这有力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很实用的政策虽然很有远见却都没办法落实。立法者拒绝对住房监察部门进行现代化管理，拒绝强化建筑法规，拒绝资助建设廉租公寓，也拒绝改善城市与郊区之间的交通。取而代之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个人权利的辩护和对要求牺牲个人增强公共部门权利的攻击都陷入了关于政策的争论。当188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削减了住房需求量，于是建造的动力也就被瓦解了。夏皮洛（Shapiro）认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市政府当局“有效而缓慢地进行了住房改革”^[13]。

然而，新的医学发现使得争论的焦点从城市环境质量问题转回到了公共卫生政策上。巴内记录道：“病菌理论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法国对肺结核的讨论，芽孢杆菌理论的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正如我在之前关于英国和美国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小得看不见的微生物世界往往会消除人体内外、家庭内外和城市内外的空间障碍。独立的邻里，花园围墙，以及其他实体障碍已经不再足以使家庭远离疾病，因为病菌无处不在。在巴黎也是一样，1980年代，对抗肺结核的焦点从公共车间转移到了私人卧室。同英格兰“家庭医生”所关注的一样，内科医生E. 瓦琳（E. Vallin）声称：“给我看看你的家，我就可以告诉你哪种疾病在威胁你。”^[14]

像瓦琳医生这样的公共卫生专家敲响了警钟，他们警告说那些贫民窟住所的内部空间就是“病菌制造厂”，它制造出病菌携带者。科学家证明，病人的排泄物是疾病在

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最普遍方式。有一个调查者发现在从歌剧院到蒙马特（Montmartre）大街的人行道上有 875 处堆积了污秽物的地方。如果你踩到了其中的一个，你的家人就会不知不觉地遭受到感染疾病的危险，因为你的鞋底会把感染源带进你的家中。于是，医学界的人相应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随地吐痰的人是全民公敌！”但实际上你再小心脚下也无法减少细菌的产生，更别说那些住在病毒感染住所而生病的人。^[15]

在 19 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巴黎的卫生学者们艰难地说服地方官员将国家权力扩展到对棚户区内部的管理。根据巴内所述，对改革的叙述表达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诠释了恶劣住所的 4 个相关特点：“缺乏阳光，不通风，污秽物以及过度拥挤。”公共卫生的倡导者将视线投向国外，寻找一种管理模式以便能够深入到住所内部检查、实行最小的礼仪标准制止这些令人不悦的灾害。在 1876 年，他们效仿布鲁塞尔的这项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支持。卫生大会召开后的一年，法国国内肺结核死亡率最高的城市勒阿弗尔（Le Havre）率先设立了类似的卫生部。但是在巴黎，改革再一次失败了。甚至是对住所之外已经存在的法律的实施也遭到了住房所有者们的日益强烈的抵制。公共卫生的倡导者们在法庭上寻求庇护，在此，他们至少可以为补救措施推迟指令数年^[16]。

在巴黎，个人自由的神圣性使得私人产权超越了公共卫生和住所合宜的最低标准。在接下来的 50 年时间里，内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无论是肺结核也好还是贫民窟也好，直到 1945 年之后它们的重建才开始减少。在战前的 40 年时间里，城市中的人口增长了 5%，而郊区人口增长了 50%，达到 200 万人。这些边缘地区不仅有富人的别墅区，也有被工厂严重污染的工人阶层区。到 20 世纪 30 年代，如此多的市郊工业区已推选出了共产主义地方政府，以致政治评论员们可以围着时髦的巴黎历史中心区画一条“红色地带”。正是在这个环带之内，于原来城墙位置的公共土地上建造的棚户区一直到 1930 年代才消失，被 4 万套公共住房单元所取代。但是这些公共住房的建造质量是如此糟糕，以致它们很快成为福利穷人的“红砖地带”的耻辱标志。在巴黎，产权法创造了阶级隔离的地理空间^[17]。

2 芝加哥，1900~1950 年

在芝加哥，白种人在不同方面使用产权法造成了两个人种间不平等和相隔离的地理格局。一方面，白种人利用产权法中的限制令和强制令迫使南部的非洲裔美国

移民聚居到隔离区中。另一方面，尽管来自于租房者的抗议不绝于耳，地方政府官员仍然拒绝加强住所规范和住所内部的健康卫生条例。城市南部的“黑人区”与周围划定了严格的边界，那里的白人业主们由于豁免起诉而肆无忌惮。他们把房间划分成越来越小的单元，同时还把房租提得很高。移民们在被挤压进这个绝望的、恶化的环境长达 50 年后，这个住宅区炸开了。当非洲裔移民们在 1945 年后跨过“人种界线”涌向城市时，迎接他们的将是愤怒咆哮的白人业主以及大规模的向郊区转移的白色人潮（图 2）^[18]。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目前为止法律之外的集体暴动是白人造成空间隔离的最为有力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盛期，发生了南部非裔美国人的第一次移民大潮，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暴乱。1919 年 7 月末，一名黑人青年因为将木筏划进了靠近第 29 大街的白人所有的湖面区域而遭到乱石投打，最终溺水身亡，芝加哥本身成为了战区。尽管暴徒们在全城袭击新近移民，但是黑人们第一次进行了反击。截止到国家防卫队出动结束暴乱，有 23 名黑人和 15 名白人丧生，500 多人受伤，造成的财产损失达数百万美元。尽管退伍老兵和“新移民”们的抵制终止了对隔离区的进一步攻击，但是暴乱为下一代定下了种族关系的航向。^[19]

在 1893 年世界博览会引发的建设浪潮时期，一个种族隔离区在城市的南部形成。届时，少量的非洲裔美国人——比 1890 年的 15000 人要少——居住在中心商业区或“鲁普”附近散落的小型隔离区内。但是由于附近街区的地产上涨，这些人开始被驱逐，他们被迫搬进了洛克艾兰（Rock Island）铁路沿线的荒宅里。

随着移民节奏的加快，这些新移民发现他们被挤在铁路和州际道路之间，这是在富人的湖畔居住区与工人阶级的河畔工业区之间经年累月所形成的无形阶级屏障。市政领导还在城市中心和世博会场地之间建造了一条高架轻轨，而高架轻轨又恰好位于州际道路中部的正下方，这就使得分割线被划得更清晰了。在种族动乱爆发的前十年里，移民人数从 44000 人迅速增长到了 109000 人，于是白人们放弃了从中心商业区最南端的火车站一直到第 39 大街之间的位于州际道路东侧的最老旧和最破败的地区^[20]。

尽管从 1920~1950 年，非洲裔人口增加了 5 倍，但是他们依然被限制在铁路和“E”轨道之间的“黑人带”里。在 1920 年，鲁普南边的第二区里移民最集中的黑人占了 70%。十年之后，有三分之二的芝加哥黑人居住在黑人比例在 90% 以上的普查区域。1920 年代，隔离区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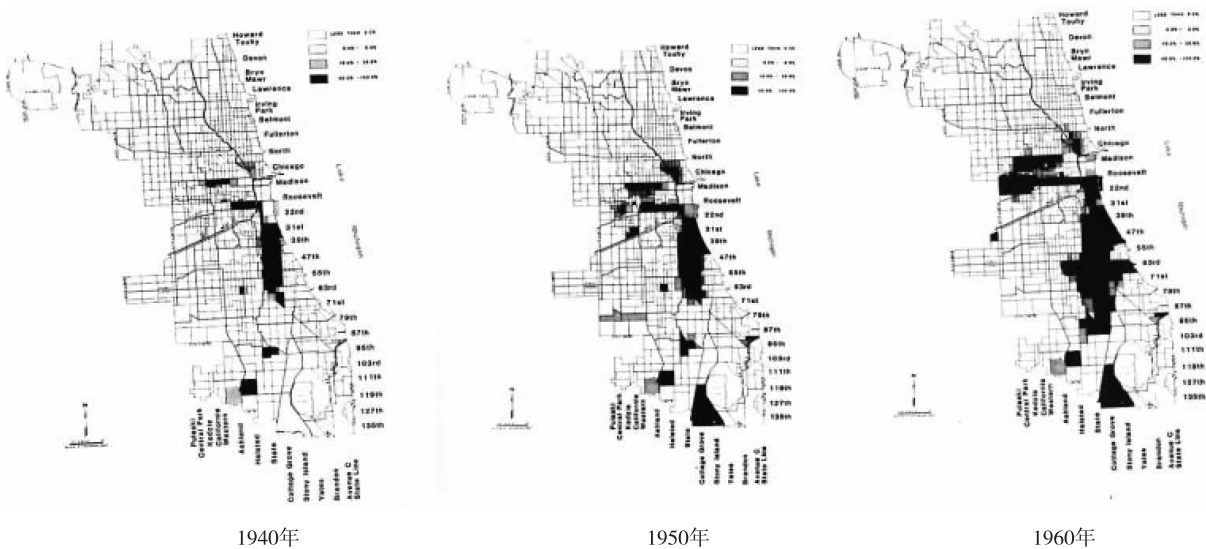


图2 芝加哥种族隔离区的扩张(1940~1960年)

注：黑色部分：表示非洲裔美国人占40%~100%人口比例的居住区。

“E1”轨道两侧的狭长地带缓缓地扩张了3km，一直延伸到了第63大街^[21]。

最明显的结果是把太多的人塞进了现存的住宅中，其中一些住宅还是19世纪建造的。除了1941年开始的艾达·B·威尔斯(Ida B. Wells)工程所提供的557套公共住房之外，这里就几乎再也没有增加过新的住房了。在对隔离区最为全面的研究之中，奥蒂斯·邓肯(Otis Duncan)和贝弗利·邓肯(Beverly Duncan)估算，到1940年为止，隔离区的人口密度是46700人/平方英里，相比之下，在整个城市范围，平均人口密度是21900人/平方英里。1950年，这两种人口密度分别是54000人/平方英里和23400人/平方英里。

邓肯兄弟称这一增长过程是：“黑人人口成堆地增长着，而他们的生活空间却没有相应地增长。这反映在居民密度的升高，通过各种改建来创造额外住房单元和住房单元拥挤度的增加。”许多没有卫生间和厨房设施的旅馆单人间或公寓单人间被出租给了住户。但是可能最糟糕且最普遍的做法就只是用硬纸板当做墙把先前宽敞的公寓分割成许多所谓的迷你“小厨房”。^[22]

尽管1919年之后一直存在着，黑人家庭的任何“侵入”都会遭到暴徒袭击的威胁，但是白人房东们更常诉求产权法来防止人种融合。在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的领导下，他们组成了邻里协会，并且在房地产出售契约上增加限制性条款，禁止把住房出售或出租给非洲裔美国人（在有些地区甚至适用于犹太人）。温迪·普洛特金(Wendy Plotkin)在她对这个题目的研究中强调说：“与其他的方

式不同的是，这些条款是政府许可的种族歧视工具。”至1939年，住房问题专家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估计城市里面有80%的白人家庭签订了该协议。而且18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数郊区，那里的开发商在每一块土地上都包含了该协议。

正如普洛特金和其他城区历史学家们所表明的，中产阶级房东与他们的工人阶级同胞们不同，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法律来保护种族的界限，而不是运用暴力。那些拥有更多资本的人宁愿躲到郊区去，也不愿正面与种族融合的威胁产生冲突。在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雪莉·v·克莱默(Shelley v. Kraemer)一案中判定限制协议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在那个时候，白人已经开始从像英格伍德(Englewood)这样的街区搬离，并允许一些非洲裔美国人搬进附带有有限性房产出售协议的房子。^[23]

如果连那些最有能力搬走的人都很少搬离隔离区的话，那么对那些刚来到芝加哥且没有足够的钱付房租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搬离的。在巴黎，私人财产所有者掌控着所有国家机构以实施他们的财产权利。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芝加哥的政府官员像地主一样把那些私自搭建房屋的人从他们所在公园、育林区、河道沿岸甚至是密歇根湖下的土地中驱逐出去。自然，美国产权法的讽刺之处是，它就是由一群来自违章建造者的国度的人所创造的。当定居者纷纷向西迁移时，他们为了把公共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先到者，就把征用公共土地转变为法律之外的合法的体制。甚至在官方的土地调查员到来之前，他们就形成了财产申明会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他们在国

会通过了先占法使这一行为制度化。^[24]

在芝加哥，最早的定居者在河流入口附近最便捷的地方建造他们的小屋。当地的原住民在1830年代早期搬迁之后，随着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的修建，这座吸引人的城市立刻摇身一变成为投资的热点。一夜之间，这里的土地被测绘、细分，然后拍卖给了投机商。一旦土地成为了私人财产，那么对于地方和国家政府来说，保护这些既得权益成为首要议程。

对非洲裔美国人采取的限制令是一个切入恰当且说明问题的案例。由于芝加哥的大部分用地在大规模移民到来之前就已经被细分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契约是包含这项条件的。种族主义的房东们不得不组织起邻居们，让律师修改房地契列入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提供的范本，并向房地契记录员提交新文件。这些文档随后就会成为私人房地契保险公司用来保证所有权可靠性的基础。公共和私人部门都运用法律的强大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以驱赶那些寮屋居民。^[25]

当法律漏洞阻碍了芝加哥人的迁移，他们就开始寻求法律之外的途径来维护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第一次臭名昭著的暴力驱逐事件发生在1858年，当时的市长“高个子约翰”温特沃斯（Wentworth）带领警察用火烧来赶走那些违章搭建的人。约有2000人在芝加哥河北岸被称作“沙洲”的地区建起了房子。这个地区位于河流与湖的交汇口北侧，它的背后修建了一条为了方便船只进出的运河，于是常年的淤泥堆积就形成了这块从湖底升起来的新的陆地。这块本来被水所淹没的土地的归属权在法庭上争论不休，使得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模糊不清。但是，市长通过声明那些寮屋居民是从事赌博和卖淫活动的罪犯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一年之后，警察对一处100户的棚户区发动了又一次的类似袭击，这个棚户区位于芝加哥河的一条支流交汇地以北的被称为“基尔加宾（Kilgubbin）”的低地地区。^[26]

但是毫无疑问，芝加哥最恶名昭彰的违章搭建者是乔治·斯崔特（George Streeter）。不像之前的那些北岸附近淹没地的占有者，他的占有声明基于合法的许可证，这个许可证是由联邦土地专利部门官员、未来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①正式签署的。1886年，斯崔特将他的住宿船抛锚停靠在这块不断升值的地产上，通过申明他作为一名违章搭建者所拥有的优先权来进一步强调他的产权。在30多年的时间里，“船长”和他的妻子一直抗拒那个权力。这个城市历史上最伟大的骗子向

投机者们售卖他的土地公司的股票，从而组成了一个小型护卫队，用来抵抗那些来强迫他搬离的受雇暴徒和警察。

尽管斯崔特在刑事法庭上机智地声称他的短猎枪只是用来对抗入侵者以保卫自己的财产，但是他却败在了一根水笔上。1918年，一名更聪明的来自芝加哥地产信用公司的律师雇佣了笔迹鉴定专家证实克利夫兰的签名是伪造的。年届80的斯崔特和他的住宿船被拆迁了。唯一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斯崔特城”^[27]。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包括大萧条时期，地方政府全力行动起来清除那些占用公共用地的违章建筑。《芝加哥论坛报》的关键词检索只报道了整个事件的一小部分。举个例子，1930年7月，芝加哥卫生部门试图清理居住了400多人的100多间船屋，这些船屋绵延停靠在贝尔蒙（Belmont）大街北面的河流北支沿岸。卫生部门的律师声称这些住在船屋里的人妨碍交通并且滋扰生事。亨利·J·斯陶特（Henry J. Stout）坚持认为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宠物狗拥有“在河流上居住”的权利，因为他们的住宅在航运河道的设计界限之外。一年以后，警察清理了隔离区里面一幢被寮屋者所占用的废弃楼房。在这个案例中，鉴于这幢房子的地基都被摧毁了，且只有倚靠着旁边的房屋上才不至于倒塌，记录中的房屋所有者J·弗拉纳根（J. Flanagan）否认这是他的财产。弗拉纳根说这幢房子所拖欠的税款太多了，以至于他“不想接受这个烫手山芋”。后来城市里的相关部门宁可把这幢房子拆除了，也不肯让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住在里面。^[28]

白人的房产拥有者和政府官员不仅实施法律把非洲裔的黑人封锁进隔离区，而且拒绝加强隔离区里面的建筑和卫生管理。这种公然的不作为行径更加鼓励房东们非法改建房屋，他们完全不顾房屋严重的毁坏程度，并且容忍着传播疾病的老鼠和虫子在房间里乱窜。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中对南部的隔离区中的贫民窟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这部小说以主人公别格·托马斯像老鼠一样的生活描写开始，他在故事里被追捕并且判了死刑。

这部小说发表于1940年，在此之后的13年，一个比赖特可以想象的更加可怕的真实故事出现在了报纸上。一伙老鼠将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咬死在了她的小床上。《芝加哥日报》发起了像水门事件一样的调查行动，他们派出了一个记者小组来调查事件真相，并引发了道德谴责的浪潮。日报发出质疑：“为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1953年的

^① 史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1908年），美国政治家，第22和第24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史上唯一担任了两任任期且并非连续的总统，也是美国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在他任期内，自由女神像在纽约市竖立（译者注）。

芝加哥？”一开始，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利用严重的住房短缺来致富的恶房东。典型的例子就是1890年建造的一个包含135间公寓的4层建筑，但是却居住了1000人，或者说人数是设计所能容纳的5倍。比如，房东将一个有7间房的公寓用纸板墙隔成4个单元。那么他通过将空间密度扩大到5倍而使得收入也从每月42美元增加到了每月200美元。^[29]

不过，当记者们深入调查法庭记录，问题的答案开始转向了公务失职和政治腐败。调查所揭示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是，隔离区的居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联邦政府的房租控制以来已经提交了上万封的正式投诉信……记者调查了这些有8英尺厚的文件，他们发现相关部门连一份投诉都没有处理过。当记者在住所法庭上把政府失职的案件一件一件披露出来时，他们挖掘得越深入，事件就越黑暗。检察官在记录住房维修项目的时候作假记录，而法官则在延期几年审理后，对那些恶劣的房东处以很少的罚款或不做任何罚款。

而且，丑闻并没有改变城市政府公务如常的态度。相反地，公众对于改革的呼声却使得更多有后台的人获得了工作机会。在第一新闻提要出来的一周内，受雇佣的8位新住房调查员中，其中只有3名有工作资格，有一名是曾经受过犯罪控告的前任警察。然而，这8个人都有政治保证人，包括那个曾经被解雇的警佐，他曾经是奥尔德曼·卡勒顿（Alderman Cullerton）第38区的区领导，还是建联委员会的主席。^[30]

在芝加哥，种族主义、腐败的政治文化和财产权的神圣性一起迫使大批的农村移民进入了隔离区。新政时期^①的市长爱德华·凯利（Edward Kelly）打破了这个传统，欢迎非洲裔美国人加入民主党。但是，他也促成了将黑人隔离在白人社区之外这一种族主义形式的制度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一批大规模移民开始了，黑人的人口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增加了三分之二，达到了812000名居民。而且，市政厅在城市南部精心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工程，这个工程转移的人数要比安置在新公共住房中的人数多成千上万。当压力不断增长到突破人种隔离分界线时，由继任市长马丁·肯内利（Martin Kennelly，1947~1955年）所率领的民主党人又回归到了更加开放的种族主义政治立场。正如阿诺德·赫希（Arnold Hirsch）所表明的，“第二次隔离区的形成”是暴徒暴行爆发和执政党在政治上退缩的结果。反对城乡工人阶级社

区融合的战斗将继续升级，直到1953年不得不再次出动国家防卫队来维持社会秩序。^[31]

3 墨西哥城，1950~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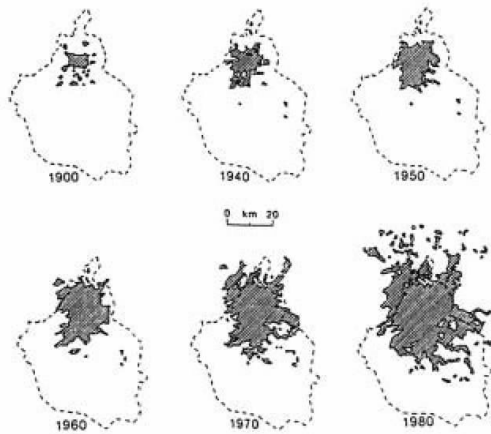
在墨西哥，对财产缺乏法律保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这个20世纪下半叶最突出的爆发性城市（Shock city）的居住模式。战时人口暴涨通过进口代理转换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总体规划。在1950~1990年之间，农村地区贫困的推动力加之工厂对工人需求的拉动力，墨西哥城的人口从300万暴涨到2000多万。政府的专家们一心要发展经济，但是相应的工人住房和城市扩展规划蓝图却没有制定。彼得·M·沃德（Peter M. Ward）评论说：“在墨西哥，最关键的问题是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规划师在政治上都没有任何发挥空间。”^[3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方的规划实际上就是没规划。政府无视对公共土地、村庄土地、社区所有用地的非法侵占，于是享有特权的产业部门就通过两种方式从中获利。雇主可以向那些既不支付租金也几乎不向地方政府缴税的工人支付较低的工资，因为地方政府没有为工人们提供基础设施改善和公共服务的开支。在战争时期实行的租金控制，相比于私人对制造业的投资，为私人对住房的投资制造了额外障碍。对于移民来说，住在条件不达标、自建住房里的权衡是不用交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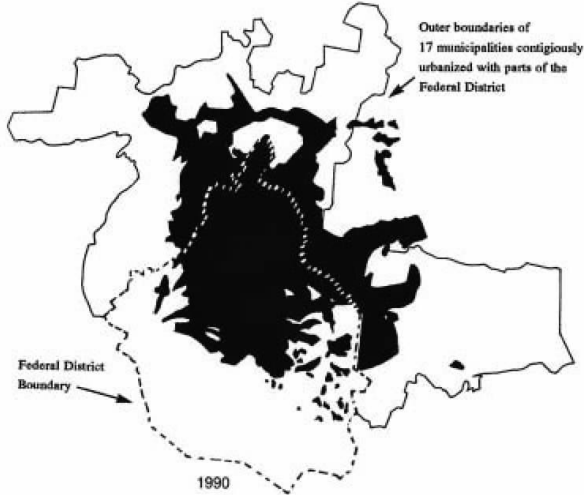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非法聚居区的大多数房屋都建造在联邦区（Federal District）的界限以内。移民们都尽可能地集聚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以便有更好的渠道获得工作、朋友、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区的政治领导厄内斯特·P·乌鲁丘尔图（Ernest P. Uruchurtu）发起了阻止移民进一步聚集的运动。他以严酷的姿态强迫那些居住者们离开联邦区，于是得到了“推土机市长”以及“铁腕”的封号。在1966年，他本人却失去了国家党派领导人的席位，原因在于他反对为准备两年后奥运会的召开而修建的地下交通系统。然而，这种新的聚居模式持续存在。实际上，乌鲁丘尔图（Uruchurtu）运动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的随意拓展，他将人口的聚集推移到了周边的临近州^[33]（图3）。

在20世纪60年代末，国家经济规划的确创造出了“奇迹”般的成果，但是在那之后一切都成为了幻影。在70年代中期，人们的实际收入开始下降，失业率开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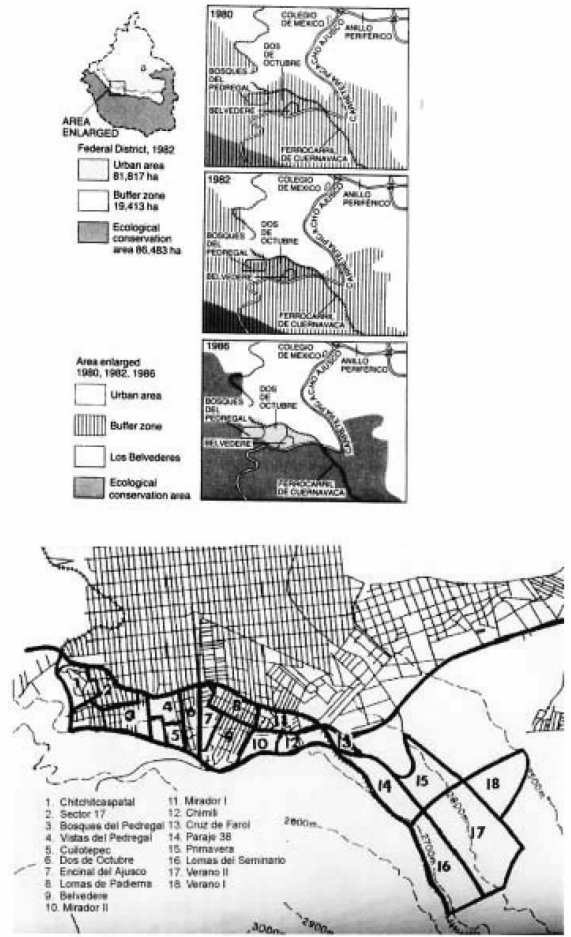
① 新政是美国F. D. 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3月~1939年间为应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墨西哥地区发展示意



阿胡斯科地区的自建社区



阿胡斯科地区

图3 墨西哥城和阿胡斯科地区的扩张 (1900 ~ 1990年)

这使得更多的工人阶级无奈地开始寻找便宜的住房。到1995年，官方统计的住房短缺量是250万个单元，这就意味着有至少700万人住在非法的聚居区中。这种非法的社区占据了城市一半以上的土地，这些居住区有些建造在陡峭的山坡上，有些则建造在有洪灾和风灾危险的低凹湖床上。但是居住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政府却要手段以遏制城市发展的名义将规划师的蓝图雪藏起来。他们制造一个小规模的铲除违章居住者的产业，被称为“驱逐机器”，因为他们配备有精锐警察部队、铁锤队、爆破部队、卫生车等^[34]。

阿胡斯科 (Ajusco) 聚居区的建立是这个传奇的一部分。这个面积大约430英亩的地区位于城市的西南边界处，它代表按区域逐步进行的另类或非正式规划的案例研究。阿胡斯科地区位于墨西哥峡谷陡峭的边缘地带，在

1970年，那里还是被森林覆盖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人居住。但是在之后的十年里，这个地方变成了15万人居住的家园。或许这种自己亲自建立起家园和社区的行为看起来很英勇，但是他们为了生存所作出的挣扎却并没有浪漫可言。

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有意选择在这个遥远山区里坡度起码有45°的山坡上定居下来，而是无奈之选。由于没有平整的地块，这个地区几乎缺乏所有的基本必需品，例如水、电、道路以及排污系统。海拔2350m是城市供水水压的极限值，由于这个地块海拔高于这个极限值，因此居民们只能把水源储存在地势最高的地方，然后再通过管道往山坡下面供水。电力的供给则是从公共事业公司非法盗用而来。

非法移居到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意味着他们不久将面临

私人 and 政府拆迁组不断的拆迁骚扰。拆迁组推倒他们的房屋，掠夺他们本来就微薄的财产。但是由于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许多人在这些毁灭性的袭击过后又重回到这里拼建房屋。阿胡斯科地区的非法居住者的境况或许有些极端，但是它代表了后 1945 年代来到首都的新移民所面临的住房问题。接下来的 50 年里，出现了三种非法聚居的模式，回应政府土地使用政策的转变^[35]。

不适合农业发展的岩石地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经历城市化，这时政府为了建造现代化的国际形象工程而征用这里的农村土地，并在这里建造了以墨西哥国家自治大学（UNAM）为主的大学城。为另外一个国际标志性项目——奥运会而发动的征地活动也随之而来。两项工程都创造了大量的建设工作岗位，而对土地的争夺也从此开始了。腐败的乡村领导和地方官员狼狈为奸，非法细分和售卖土地，有时候一块土地还进行多次买卖。大型项目建造商也开始进入阿胡斯科地区，它们以环境优势，如空气清新、人口密度低和交通顺畅等作为规划发展的基础而在这里建造昂贵的住宅。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在铁路轨道以北相对容易获得的土地都已经被侵占了^[36]。

在铁路的南侧出现的第二次聚居浪潮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因为他们的建造活动并没有得到业主和政府的许可。对洛马斯·德·帕蒂尔纳（Lomas de Padierna）社区的非法接管说明了同政府随后发生的对抗是如何加强社区的社会纽带。人们需要社区的社会纽带承担街区的实际规划。在这场被称为“生存之战”的自我保卫过程中，居民们对社区形成了一种认同感。

1971 年，一个名为厄休拉（Ursula）、年近 30 的单身母亲的简陋棚屋被拆除了，于是她成为了对抗的领袖。她愤怒、绝望地回忆：“在我的房子被推倒时，整个社区联合了起来，大家用石头帮我重建了房子。”之后她加入了给水委员会，并且开始参与到给蓄水桶内部刷油漆以防止生锈等这一类工作中。其他委员会还划分了宅基地和道路，建立起了集体对抗拆迁的保卫体系，而且还组织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在之后的三年里，因为其他领导者被捕且被迫搬迁，于是越来越多的居民都把厄休拉当成了自己的指望^[37]。

学生激进分子在洛马斯·德·帕蒂尔内社区的非官方规划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社区规划改变了环境和人们的认同感。国家自治大学（UNAM）的学生来帮助定居者实现自治，并且建立起了小学。同在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住宅区（Tlateloco）附近发生大屠杀之后的其他许多学生一样，他们都是独立人民战线（Frente Popular Independiente）的成员，这个组织采纳毛泽东

思想（Maoist）的基层激进主义。他们在一年之内建立起了一个可容纳 300 名学生的学校，这一行动赢得了居民们的敬佩，同时也为社区的建立带来了动力。学生们还帮助厄休拉和集会里面的其他成员向政府请愿，请求修建公立学校，供应饮用水，以及提供其他的公共设施^[38]。

在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ia）的任期内，政府关于城市环境的政策开始从排斥非正规规定居者转向团结他们。作为内政部长，他曾经被卷入了伏击和镇压学生的事件中，但他还是一名经济改革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经典理论认为这种社区代表了一种病态的、孕育“贫穷文化”的土壤，但是埃切维里亚否认这种看法，他采纳更新的、相反的理论，认为这种社区是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必要部分。1973 年，他在联邦区内建立了城市发展信托基金来作为一个正式的规划机构。这个机构负责调解土地配置，签署所有权证书，收取财产税以及提供城市基础设施。三年之后，政府实行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法案——《人居法》（Law of Human Settlements）^[39]。

对于洛马斯·德·帕蒂尔内社区来说，新的政策为他们在土地所有权的争夺中争取到了胜利，但是代价就是放弃社区自治。1974 年 4 月，地方官员们无视法律，使出最后的招数来驱赶居民。不过，居民们却很好地组织起来，共有 3000 个居民在防卫警钟敲响时集合了起来。他们的联合立场阻止了推土机和警察的侵入。厄休拉认为：“通过这一次的行动，我们的运动（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了尊重。”政府认输后，同意让厄休拉作为当地人民的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在接下来四年的艰难谈判中，居民们要求拥有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利，自己建造房屋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同时要求警察停止镇压行动。而政府方面坚持联邦区要对合作过程进行管理，制定土地价格，并且要将他们重新获得的一半的土地划出来按市场价格再次出售^[40]。

最终，厄休拉愿意放弃自治权来换取和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她赢得了特许只以 40% 的市场价格保有原有大小的土地。学生激进分子对于社区运动向一党独大的制度改革党（PRI）投降感到了背叛。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厄休拉是为了居民的利益而做的实际考虑。况且这个聚居区里也有了一座公立学校的建设，还安装了水管。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有许多居民乘着这里土地价值的上升而变卖了自己的地产，从而使得这个社区变成了一个更中产阶级化的街区^[41]。

1976 年，在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洛（Jose Lop-

ez Portillo) 任职期间, 另一种生态聚集模式的非法聚居区开始形成。民族学家米格尔·迪亚斯-巴里加 (Miguel Diaz-Barriga) 提出: “对城市发展进行规划的尝试, 标志着对城市扩张、贫穷和集体组织从合并到遏止的国家政策重新定义。”实际上, 他的观点是认为波蒂洛政府采取专家治理环境的观点, 企图赋予自然一种理性的秩序^[42]。

至 1976 年, 已经有大约 5 万人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 而且当时聚居区已经蔓延到了铁轨南侧, 进入政府刚划定的生态保护区。短时间内, 这个地区涌入了 2 万~2.5 万人, 住在临时的棚屋中, 他们的房顶子都是用涂了沥青的卡纸板搭的, 然后用质量很差的夹板或者砖来作为分隔墙。这一类新的社区有博斯克·德尔·佩德雷加尔 (Bosques del Pedregal)、克洛特佩 (Culotepec)、多斯·德·奥克特布尔 (Dos de Octubre) 以及贝尔韦代雷 (Belvedere)。

然而, 对于绿化地带的侵占引来了拆迁部门的反击。1977 年, 政府动用“驱逐机器”企图赶走居民。人们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拆除了三次, 其中一些人又回来重建了三次。但是当政府第四次来袭,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决心坚守土地、保卫家园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僵持了 72 小时后, 居民们得到了来自大学生和基于工会的非政府组织的外援支持。接近 1977 年 6 月 6 日时, 警察受到更大规模的群众围攻, 人们手持棍棒和石头将自己武装起来。于是城市政府再一次撤退了^[43]。

接下来的事件有了扩展, 发展成了长达 8 年的政治谈判, 为大约 5000 个家庭签发了官方土地证。在此期间, 双方都用环境报告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一方面, 规划师指责阿胡斯科山坡上的聚居区破坏了脆弱的生态环境, 因代价太大而不能为他们提供城市基础设施, 并且他们违反了限制城市扩张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 生态民粹主义者谋求了大量的外援组织, 包括从附近的大学科学院到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制定了一个生态生产型聚居区的对抗规划。例如, 居民合作社种植并收获 2 万株果树来反对政府因近期规划的商业而进行的森林砍伐。社区还提出要安装环保型的污水循环系统用以生产肥料和种植蘑菇。

相反的, 他们的专家同盟们则指责规划师们在生态保护绿带的附近布置了对城市污染最严重的东西——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双方都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 但是垃圾场的问题却削弱了城市的公信力。最终, 居民在阿胡斯科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他们赢得了产权证书, 这个结果大多是由于执政党的极扭曲腐败的、安抚社会动乱的权术所导致的^[44]。

不过, 这个新城区对自然环境有负面影响。通过把生

态民粹主义者转化成为财产拥有者, 权力部门立刻就达到了削弱草根运动的目的。随着社区合作精神的消散, 环境消耗融入到生产之中的项目也没法推进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基本上被公共部门和私人业主共同占有了。阿胡斯科地区从此不再是农村的开放地带, 也不再是城市绿化带保护区。

自从 1985 年阿胡斯科斗争解决之后, 这个情况在保护区确实重复了数百次。在一个像墨西哥城这样人口密集、充斥着腐败和不可靠产权的城区, 看似有益的、创造生态保护区的行动恰恰产生了相反的和负面的影响。实际上, 禁止发放用来限制合法商业和土地细分开开发的建筑许可证鼓励了非法搭建者利用开放空间。由于政府似乎陷于失败的城市限制规划, 结果却使得城市蔓延和环境恶化更严重^[45]。

4 结论

在这里描述的三个案例中, 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关联组合在城市经历爆炸性人口增长的时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巴黎、芝加哥、墨西哥城, 农村移民的数量都远远地超出了住房的供给量。在每一个案例中, 产权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来者的地理区位和住宿条件。在巴黎, 对个人自由的痴迷使得私人财产优越于公共健康, 从而造成了阶级分化的景象。穷人注定要生活在充满死亡和疾病的过度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和郊区棚户区内。在芝加哥, 产权法成为了将种族主义制度化的强效工具。在白人业主和他们腐败的政治代表的操控下, 法律迫使“成堆的”非洲裔美国人住进了隔离和不公平的贫民区。在墨西哥城, 精英领导者们先于大众福利推行他们自私的国家经济现代化规划。由于缺乏土地, 上百万的农民都被迫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和社区。

虽然这些比较性的历史研究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支持了埃尔南多·德·索托的关于“资本主义之谜”的论文, 但也强调了它的局限性。可以肯定的是, 他呼吁穷人应该以霍雷肖·阿尔及尔 (Horatio Alger) 式的艰苦奋斗来换取成功, 这使他成为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者的宠儿。他们还赞同于他的改革提案, 摒弃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带来的障碍, 释放了万亿美元“呆滞资本”来进行更加有效的使用和获取个人利益。而且他们声称, 财产所有权可以将非法商业活动转化成为增加公共福利的税收贡献者, 从而促进社会收入。

但这种自由市场现代化的“生存模式”已经使得德·索托的“贫穷的资源”在全球的范围内变成了“资源的贫

乏”。梅赛德斯·冈萨雷斯·德·拉·罗歇（Mercedes González de la Rocha）认为，四分之一世纪里的大规模经济重组已经使大量世界人口边缘化，以至于“贫困家庭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根据20年里对墨西哥的城市工人阶级的观察经验，人种学家否认德·索托的向上流动的乐观模式的有效性。相反地，穷人们持续的贫困颠覆了他的论题，缺乏食物、衣服和住所等生活必需品的家庭越来越多，仅仅是财产所有权将几乎无助于缓解这种残酷贫困的困境^[46]。

在撒切尔一里根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继续在“第一世界”对穷人产生影响，如法国和美国，同时依然影响着“第三世界”，如墨西哥。这些国家在应对富人和穷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时，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塑造他们的应对方式时仍然发挥着强烈的作用。例如，在巴黎，最近由种族/宗教少数民族在郊区公共国民住宅所引起的严重暴乱反映了持久的阶级隔离后遗症。2005年爆发的遍及法国市区的青年手机暴乱中依旧回荡着1965年瓦茨区（Watts）骚乱（洛杉矶）时的咒语“烧吧，烧吧”，这是那些被孤立和排除在周围一切繁华之外的绝望呼声^[47]。

芝加哥的种族主义和腐败的政治文化仍然像以前那样在用相似的方式上演，只是换成在大都市地区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正在进行的哈佛民权（Harvard Civil Rights）研究勾勒出明白无误的、非裔美国和其他少数民族再次被隔离的模式，跟19世纪90年代的模式如出一辙。虽然民权运动消除了贫民区和隔离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界限，也使郊区不再封闭，但是白人的反应却还是尽可能的敬而远之。

市长理查德·J·戴利（Richard J. Daley）修建了第二代的高层国民住宅贫民窟，他的儿子——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通过拆除第二代建立第三代贫民窟。由于没有为居民提供房屋置换，四分之三被破坏了房屋的居民被迫搬进了最贫穷和最受隔离的社区。法规第8条所承诺的提供在私人楼宇出租公寓的住房券一直是个残酷的玩笑。《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着经济和种族上的隔离”。1997年，有11万人申请了共3.5万张住房券。十年之后，不止十分之一的、被选定的人，或3800户家庭，还在轮候名单上。在此期间，公共房屋的供给不足问题变得更糟。一年之后（2008年），芝加哥房屋委员会（CHA）公布将募集新增4万张住房券。一天一台电脑故障之后，25.6万人已在网上登记申请了住房券。在扭转穷人在市中心过度集中的同时，第三代贫民窟的形成却是以拥挤的小型邻里、肮脏的

郊区的不断蔓延为特征，同时还伴随着富人封闭式小区在城市远郊的增加^[48]。

在墨西哥，制度改革党（PRI）的长期统治最终被另外一个政党所取代，但是国家现代化经济规划仍然比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福利优先考虑。因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小汽车的生产远比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对自然环境和人类造成的损失要重要。况且，墨西哥城依然还是荒野西部的投资前线，任何事情都是说干就干的。当这个爆炸性城市全面蔓延开来时，工人阶级的需求，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包括一个体面的居所，都已变得越来越艰难了^[49]。

参考文献

- [1]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2007* (London, 2007).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about 6.7 billion people. Also see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2006). Cf. the scathing criticism of Thomas Angotti, who takes Davis to task for his use of the word *slum*. See Thomas Angotti, "Apocalyptic Anti-Urbanism: Mike and His Planet of Slu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0 (2006): 961-67.
- [2] Ann-Louise Shapiro, *Housing the Poor of Paris, 1850-1902* (Madison, WI, 1985), xiii, for the quota-tion; *ibid.*, 132, for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Also see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1985); and Jeanne Gaillard, *Paris, La Ville (1852-1870)*, new ed. (Paris, 1997). For Chicago, see Otis Dudley Duncan and Beverly Duncan, *The Negro Population of Chicago: A Study of Residential Succession* (Chicago, 1957). For Mexico, see Fernando Romero and Mexico Laboratorio de la Ciudad, "Zmvm: Zona Metropolitana Del Valle De Mexico," in *Zmvm: Zona Metropolitana Del Valle De Mexico* (San Angel, Mexico, 2000); and Priscilla Connolly, "Mexico City: Our Common Futur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1 (April 1999): 53-78.
- [3] H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2000), 7, for the quotation. For a brief sketch of de Soto, see "Hernando de Soto's Biography," www.cato.org/special/friedman/Desoto/index.html (accessed May 24, 2010).
- [4] A. L. Beier and Roger Finlay, eds.,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 (London, 1986), 39, for demographic statistics;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1991); Colin Jones, *Paris: Biography of a City*, 1st American ed. (New York, 2005), 305-18, for population statistics; Harvey, *Consciousness*, 68-80, for railroad mileage; and David H. Pinkney, "Migration to Paris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5 (March 1953): 1-12, for a detailed ge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farm to factory migration.

- [5] Jones, Paris, 317, for the quotation; and Pinkney, "Migration to Paris."
- [6] Harvey, *Consciousness*, 82 for the quotation.
- [7] *Ibid.*, 94
- [8] *Ibid.*, 96—166.
- [9] David S. Barnes, *The Making of a Social Disease: Tuberculosi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1995), 10, for the quotation. Cf. *ibid.*, 1—22; Allan Mitchell, "Obsessive Questions and Faint Answers: The French Response to Tuberculosis in the Belle Époqu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62 (1988): 215—35; and David S. Bar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uberculosis in Belle-Époque France: A Reply to Allan Mitchell,"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5 (1992): 279—90.
- [10] See Jones, Paris, chap. 9, on Haussmann; and L. G. Stevenson, "Putting Disease on the Map: The Early Use of Spot Maps in Yellow Fev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0 (1965): 226—61. Also see Sabine Barles and Laurence Lestel, "The Nitrogen Ques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River Quality in Paris, 1830—1939,"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3 (2007): 794—812; David S. Barnes, *The Great Stink of Paris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Struggle against Filth and Germs* (Baltimore, 2006); and Anthony Sutcliffe, *The Autumn of Central Paris: The Defeat of Town Planning, 1850—1970*, *Studies in Urban History* (London, 1970).
- [11] Shapiro, *Housing the Poor*, 85, for the quotations.
- [12] *Ibid.*, chap. 5; Harvey, *Consciousness*, 145—67; and Roger-Henri Guerrand, *Les Origines Du Logement Social En France* (Paris, 1966). Also see Rosalind H. Williams, *Notes on the Underground: An Essay on Technology, Society, and the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1990).
- [13] Shapiro, *Housing the Poor*, 128, for the quotation; *ibid.*, passim, 111—33.
- [14] Barnes, *Making of a Social Disease*, 81, for the first quotation; Shapiro, *Housing the Poor*, 137, for the second quotation. On the impacts of germ theory on contemporary spatial perspectives, see Harold L. Platt, "From Hygeia to the Garden City: Bodies, Houses,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Slum in Manchester,"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3 (2007): 756—72; and Annmarie Adams, *Architecture in the Family Way—Doctors, Houses, and Women, 1870—1900* (Montreal, 1996).
- [15] Barnes, *Making of a Social Disease*, 83—111.
- [16] *Ibid.*, 114, for the quotation; *ibid.*, 112—37.
- [17] Jones, Paris, 359, for the quotation; *ibid.*, 385—425; Sutcliffe, *Autumn of Central Paris*.
- [18] The basic text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ghetto are St. Clair Drake,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1945); Allan H. Spear,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Chicago, 1967); Arnold R.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1983). On the post-WWII era, also see John T. McGreevy, *Parish Boundaries: The Catholic Encounter with Ra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rban North*, *Historical Studies of Urban America* (Chicago, 1996); and Eileen McMahon, *Which Parish Are You From? A Chicago Irish Community and Race Relations* (Lexington, 1995).
- [19] For the great migration and race riot, see James R. Grossman, *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Chicago, 1989); Spear, *Black Chicago*; William M. Tuttle, *Race Riot: Chicago in the Red Summer of 1919* (New York, 1970).
- [20] Harold L. Platt, *Shock Cities: Th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Manchester and Chicago* (Chicago, 2005), 167—71; and Margaret Garb, "Draw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Real Estat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cago,"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2 (2006): 773—78.
- [21] Philpott, *Slum and Ghetto*, 127, for the statistics; *ibid.*, 111—200. Also see Duncan and Duncan, *Negro Population*.
- [22] Duncan and Duncan, *Negro Population*, 145, for the quotation; *ibid.*, 142—56, for statistics.
- [23] Wendy Plotkin, "Deeds of Mistrust: Race, Housing and Restrictive Covenants in Chicago, 1900—195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1999), 2, for the quotation; *ibid.*, 1—42.
- [24] See James Willard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 1956); de Soto, *Mystery of Capital*; and Walter T. K. Nugent, *Habits of Empire: A History of American Expansion* (New York, 2008).
- [25]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Plotkin, "Deeds of Mistrust."
- [26] Weston Arthur Goodspeed and Daniel David Healy, *History of Cook County, Illinois*, 2 vols. (Chicago, 1909), 1: 290—91.
- [27] See Everett Guy Ballard, *Captain Streeter, Pioneer* (Chicago, 1914), for an autobiographical memoir recorded by Ballard. For his final act, see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7—14, 1918.
- [28] *Chicago Tribune*, July 19, 1930, July 4, 1931.
- [29] *Chicago Daily News*, June 10, 1953, for the quotation; *ibid.*, June 12, 1953, for the story of the apartment building at 4500 Vincennes; *ibid.*, June 11—20, 1953. In addition, the records showed that 180 people had died in fires in slum buildings in the ghetto, caused most often by overloaded electrical circuits; and 57 people were on record for rat bites during the year. Richard Wright, *Native Son* (New York, 1940). Wright's novel was based on a true story. See Richard Cahan, "Another Native Son," *Chicago Magazine* (June 2001): 89—91, 124—30. Ironically, on the day the infant died, March 27, 1953, the city announced a massive slum clearance project on the Near South Side, which would be funded in large part by private developers. See *Chicago Tribune*, March 27, 1953.

- [30] “Chicago Shame,” *Time*, June 29, 1953, 75, for the revelation of ten thousand complaints; *Chicago Daily News*, June 13–19, 1953.
- [31]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oger Biles, *Big City Boss in Depression and War: Mayor Edward J. Kelly of Chicago* (DeKalb, IL, 1984); Roger Biles, Richard J. Daley: *Politics, Race and the Governing of Chicago* (DeKalb, IL, 1995); and Amanda I. Seligman, *Block by Block: Neighborhoods and Public Policy on Chicago’s West Side* (Chicago, 2005).
- [32] Peter M. Ward, *Mexico City*, Rev. 2nd ed. (New York, 1998), 159, for the quotation; *ibid.*, 1–86, for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 [33] Diane E. Davi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xico City: Political Conflict and Urban Development, 1950–1966,”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4 (1998): 364–415.
- [34] *Ibid.* Also see Keith Pezzoli, *Human Settlements and Planning for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Case of Mexico City* (Cambridge, MA, 1998), 3–35, 69–104. Pezzoli illustrates the plight of the average worker by calculating that one day’s minimum wage could buy 18 pounds of beans in 1981 but only 5.5 pounds ten years later. In a similar way, Susan Eckstein found in 1987 that almost all of her long-term oral history respondents reporte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basic conditions of life. Many were reduced to one meal a day. See Susan Eckstein, “Formal versus Substantive Democracy: Poor People’s Politics in Mexico City,”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6 (1990): 213–39. Also see Mercedes González de la Rocha, “From the Resources of Poverty to the Poverty of Resources? The Erosion of a Survival Mode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8 (2001): 72–100.
- [35] On Ajusco, I draw heavily on Pezzoli, *Human Settlements*; and Miguel Diaz-Barriga, “Urban Politics in the Valley of Mexico: A Case Study of Urban Movements in the Ajusco Region of Mexico City, 1970–1987”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 [36] Diaz-Barriga, “Urban Politics,” 43–89.
- [37] *Ibid.*, 97, for the quotation; *ibid.*, 91–169. “Ursula” is the name given this leader in the oral history taped by Diaz-Barriga.
- [38] *Ibid.*, 91–169. On the student massacre, see Vivienne Bennett,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opular Movements in Mexico between 1968 and 1988,” in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dentity, Strategy, and Democracy*, ed. Arturo Escobar and Sonia E. Alvarez (Boulder, CO, 1992), 253–57; Elena Poniatowska, *Massacre in Mexico* (New York, 1975). On the political shock waves following the massacre, see Susan Eckstein, “Poor People versus the State and Capital: Anatomy of a Successful Community Mobilization for Housing in Mexico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4, no. 2 (1990): 274–96; and Juan Manuel Ramirez Saiz, “Urban Struggle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Popular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exico*, ed. Joe Foweraker and Ann L. Craig (Boulder, CO, 1990), 234–46.
- [39] Diaz-Barriga, “Urban Politics,” 110–69. Peter Ward called the 1968 law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piece of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in Mexico.” See Ward, *Mexico City*, 163, for the quotation. On Oscar Lewis and his critics, see Janice E. Perlman,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Urban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Rio De Janeiro* (Berkeley, 1976); Eckstein, “Poor People versus the State and Capital”; and Lucio Kowarick, “Social, Economic and Civil Vulner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Brazi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 (2005): 268–82. O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ee Stephen P. Mumme, Richard Bath, and Valerie Assetto,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3, no. 1 (1988): 7–34.
- [40] Diaz-Barriga, “Urban Politics,” 133, for the quotation; *ibid.*, 101–69. Also see Eckstein, “Formal versus Substantive Democracy.”
- [41] *Ibid.* In 1977, FEDEURBE was replaced by the Comisión de Desarrollo Urbano (CODEUR), which conducted the final negotiations. The original lot sizes were five hundred square meters. The sale price was forty pesos per square meter as opposed to the CODEUR offer of one hundred pesos per square meter.
- [42] Diaz-Barriga, “Urban Politics,” 172, for the quotation; *ibid.*, chap. 4. Also see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1998).
- [43] Pezzoli, *Human Settlements*, chap. 9.
- [44] *Ibid.*
- [45] *Ibid.*, 271–340. Cf. Basil van Horen, “Developing Community-Based Watershed Management in Greater Sao Paulo: The Case of Santo Andr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3 (2001): 209–22; and Pedro R. Jacobi, “The Challenges of Multi-Stakeholder Management in the Watersheds of Sao Paulo,”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6 (2004): 199–211.
- [46] González de la Rocha, “From the Resources of Poverty”; and note 33, above. On de Soto’s champions and critics, see “Hernando de So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nando_de_Soto_\(economist\)](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nando_de_Soto_(economist)) (accessed September 8, 2008).
- [47]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11, 2005, for the Paris uprising. For the impacts of global restructuring on U. S. cities, see William Sites, “Global City, American City: 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Approaches to Urban Histor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9 (2003): 222–46; Janet L. Abu-Lughod, *New York, Chicago, Los Angeles: America’s Global Cities* (Minneapolis, 1999); Edward W. Soja, “From Crisis Generated Restructuring to Restructuring-Generated Crisis,” in *The City: 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Allen John Scott and Edward W. Soja (Berke-

ley, 1996), 426 –62; and Jennifer Wolch, “From the Global to the Local: The Rise of Homeless- ness in Los Angeles During the 1980s,” in Scott and Soja, *The City*, 390 –425.

[48]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27, 2005, for the quotation. At that time, 51000 names were on the (closed) waiting list for public housing. See *ibid.*, August 2, 2005, April 17 –18, 2008. For the new patterns of segregation on a regional scale, see Harvard Civil Rights

Project, “Race, Place, and Opportunity: Racial Change and Segregation in the 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1990 –2000,” http://www.civilrightproject.ucla.edu/research/metro/three_metros.php (accessed May 24, 2010) .

[49] González de la Rocha, “From the Resources of Poverty”; and Connolly, “Mexico City.”